

## 文化热点

## 《陈风图》的意义

任动

宋高宗赵构书画、马和之绘画的南宋书画神迹《陈风图》，堪称淮阳的《清明上河图》，为周口市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历史实物支撑，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宋高宗赵构在位末期和宋孝宗赵昚在位前期，高宗亲自书写了《毛诗》全文，并诏命宫廷画家马和之依据诗意进行配图，成就了300多幅“书画合璧”之作。遗憾的是，这些法书宝绘，存世无多。《诗经》大约可画二十卷，总计约三百幅的画面，留存至今的真迹也就十卷左右，《陈风图》卷就是其中难得的一卷。《陈风图》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之一”的周口先贤张伯驹先生，嗜书画成癖，一生豪掷巨金购藏大量珍贵法书名画，其中不乏神品巨迹、国之瑰宝。张伯驹不仅雅好收藏，而且特别注重法书名画的世传有绪，因而，从

1932年(壬申岁)至1960年(庚子岁)，张伯驹用近30年时间，著录《丛碧书画录》，介绍其入藏的117件书画精品。《丛碧书画录》收录有宋高宗赵构书画、马和之绘画的2幅作品：《诗经节南山之什图卷》和《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卷》。对于这2幅作品，张伯驹倍加青睐，极为重视，由此可见赵构和马和之书画合璧的重要价值。

比如，谈及《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卷》，张伯驹如是说：“绢本，画墨笔，淡浅绛着色。后有文徵明跋，谓作士气兼备。两卷均书画相间。载《石渠宝笈》。高宗书，严整秀润，出自《黄庭经》，在宋诸君书法中当以为冠。和之画山水钩法与人物开脸自成南宋一家。”南宋开国皇帝高宗赵构，其书法严整秀润，“在宋诸君书法中当以为冠”，并曾引领南宋一代书风。马和之则是一位山水、人物、花鸟全能的画家，“山水钩法与人物开脸自成南宋一家”。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卷》，书画相间，士气兼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曾入藏清宫内府，被《石渠宝笈》著录。

和《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卷》一样，《陈风图》亦是精品。《陈风图》曾入藏清内府，并受乾隆皇帝青睐。乾隆不仅在《陈风图》卷后作有长跋，还将其录入《石渠宝笈》。我们知道，《石渠宝

笈》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著录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内府所藏的历代书画。《石渠宝笈》不仅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为鼎盛时期的优秀作品，而且负责编撰的人员，大都也是当时的书画大家或书画研究的权威专家。因此，《陈风图》能够录入《石渠宝笈》，说明其自有独到之处，绝非徐邦达所言：“此一套画不但较明显地看出非一人之作，甚至一卷中各篇也是由多人杂凑完成的。即不是因为书法的关系连带定为尽非马和之之作，光看画的水平——就画论画，把它也全盘‘推翻’，亦无不可。”

《陈风图》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国宝外流，甚为可惜。冯剑星说：“上世纪70年代，王季迁将所藏二十五件宋元书画转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其中就有《陈风图》。后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又将《陈风图》转售给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直至今日犹藏于该馆。”王季迁也位列“二十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和张伯驹齐名。王季迁(1906年~2003年)，又名季铨，字逸青，江苏苏州人，集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及学者头衔于一身，在中国书画的研究、鉴赏及收藏上，备受海内外书画界的肯定与推崇。王季迁家学渊源，其十四世祖王懿是明代宰相，因而家族收藏十

分可观。他早年师从顾麟士学习绘画，后拜吴湖帆为师。提及“过云楼”，收藏界恐怕无人不知。作为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过云楼”是清代怡园主人顾文彬收藏文物书画、古董的地方，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顾麟士乃顾文彬之孙，擅画山水，亦精鉴别。吴湖帆则是“二十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之一。跟从两位大师学习，耳濡目染，王季迁自然收获了丰富的书画鉴藏知识，并卓然成为海内收藏大家。

张伯驹说：“为保存研究国家文物，我们能致富而不致富，能享受而不享受，不作我们的私产，到我们的研究工作终了，交给国家。”他最终将一生收藏书画珍品，悉数捐献给国家。1956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即一代文学大师茅盾，亲自给张伯驹签发了“褒奖状”，“特予褒扬”张伯驹“化私为公，足资楷模”的无私高尚的捐赠行为，“感谢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但是，同为收藏大家的王季迁却将所藏宋元书画名迹转让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二者相比，更能凸显张伯驹先生是“一位热爱自己民族文化艺术的爱国人士”“一位非比寻常的中华文化的弘扬与捍卫者”“一位难与伦比的文化战士与艺术英雄”。①8

危樯倒影布层层，  
檐外星河转玉绳。  
浪近黄流争作势，  
岸当黑夜隐生楼。  
沿河市散嘶归马，  
隔水楼高见远灯。  
西望岷峨仍万里，  
云天何日许飞腾。

——吴赞诚《周家口晚眺》

诗词周口

## 《周家口晚眺》

## 看清朝周家口的「昨夜星辰」

常全欣

周家口在史料上出现，最早是在明朝隆庆四年安徽商人黄汴所著的《明一统路程图记》中。在此之前，其发展脉络需要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进一步去发掘、梳理、印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受益于“颍歧口”曾经的兴盛繁华、贾鲁河航运的沉沉浮浮，从荒村野渡到通达四方，从人丁稀少到商贾云集，周家口在明朝肇始、勃发，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舞台。

经过明朝中后期的发展，周家口在清朝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年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周家口达到发展的鼎盛。清康熙时期移设周家口，统管全镇市面，周家口遂成繁荣市镇。康熙初年，永宁集地方1132户，周家口地方1919户，“相传人口一度发展到20余万人”(《周口市志》1994年版)。雍正十一年陈州知州董起盛奏请陈州升府，其陈述的理由为：“陈州幅员辽阔，绵亘数百里，界连八邑，犬牙相错，河通淮泗，路达江楚。更有所属周家口一带地方，水陆交冲，五方杂处。一切刑名钱谷，稽查保甲，各处验勘难以悉举，事本繁多。”此项奏报很快获得批准，雍正十二年升陈州为府，并添设粮捕水利通判“驻扎周家口”。乾隆年间，周家口开辟渡口16个，沿岸百舸争流，首尾相衔，民间有诗“初来不识陈州路，瞥眼先疑是府城”。

《周家口晚眺》记录了一天夜晚吴赞诚(1823年~1884年)看到的周家口景象：有河上的危樯，有天上的星星，有桥边的夜市，有马匹，有高楼，有岸边的灯火……看上去一派繁荣。

但实际上，吴赞诚所在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周家口已经远离鼎盛，慢慢走上了萧条的道路。当时，海运逐渐取代河运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主要渠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河在中牟决口，致使贾鲁河淤积，周家口北上开封的航道受阻，贾鲁河航运一蹶不振。咸丰元年(1851年)至咸丰八年(1858年)，捻军的战火烧到了周家口，给周家口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吴赞诚的《周家口晚眺》具体成诗时间不详。据考证吴赞诚生平录，这首诗可能与他在任福建船政期间赈灾河南一事有关。1876年至1879年，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发生了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旱灾——“丁戊奇荒”。负责赈灾的李鸿章建议，应在上海购买大批价格较低的粮食，由吴赞诚调拨几艘福建船政局的轮船协助运送粮食至北方，借此抑制灾区被抬高的物价，这一建议被清政府采纳。吴赞诚接到谕令后就与李鸿章等商榷具体措施，并选择3艘轮船到上海购粮，如期运往北方交李鸿章调遣。此时的周家口虽然不如乾隆时期繁荣，但仍因航运之利，在光绪三年秋被清政府设置为向未受灾省区购粮的采粮据点之一。由此推测，吴赞诚极有可能在此期间抵至周家口。

## 历史溯源

## 民国时期的周口匪患

周保堂

民国时期，周家口凭借南北航运枢纽的重要地理位置，延续了清晚期的转运贸易，依然是中原地区的商贸中心。市镇三寨毗连、隔河相望，寨内人烟稠密、富商云集，街上票号、钱庄、店肆林立，码头舟船簇集、财货堆积。白天南寨大十字街熙熙攘攘，夜晚码头万家灯火。经济的繁荣引起了土匪的覬覦。在民国存续38年间，多股土匪攻陷周家口，有记录的就近十多次，他们烧杀抢掠，绑票勒索，奸淫妇女，强行摊派，无恶不作，对周家口的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历史学者秦国攀、孟伟在所著的《周口、天下一》中认为“社会动荡不安，匪患破坏严重，这是导致民国期间周家口衰落的直接原因”。

土匪在豫东也称为“杆子”“窟将”“响马”“刀匪”“刀客”。清朝末年，由于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等因素，土匪趁乱蜂拥而起，进入民国后，匪患猖獗。为攫取更大利益，土匪直接攻打城镇，当“围子”(黑话，城寨)久攻不下时，他们就“碰杆”(黑话，多股土匪合在一起)强攻。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又分属两个县的商贸重镇周家口，在土匪侵袭时首当其冲。据《周口市志》(1994年版)记载，“民国12年(1923年)4月27日，周家口被老洋人(张国信)哗变之部队攻破，占领三昼夜”“民国13年(1924年)10月1日，杆首路老九带领500人，攻破周家口，绑票数百人”“民国15年(1926年)8月11日黎明，

杆首牛绳五率领万余人进犯周家口南寨，12日破北寨，烧杀掠夺、奸污妇女，无所不为”“民国16年(1927年)5月10日，合股杆众，进攻淮阳县，攻城不克，西陷周家口镇”“民国17年(1928年)正月初五，杆首史万成，攻破商水县城，盘踞56天，县城附近柴堂、艾营(现属周口)深受其害”“民国17年6月6日，杆首吉维成(又称老吉子)率众攻破周家口北岸，部分民宅、商店被掠夺、焚烧”“民国37年(1948年)4月10日，杆首张庆禄(外号张豁子)……是夜窜入周口，抓走贫民积极分子11人，其中7人在太康县被活埋”“民国37年7月29日，土顽张庆禄、党修文等由商水进犯周口，杀害妇女1名，扔进河里7人，两日后离去”……“杀死数百人”“掠夺不计其数”“洗劫一空”“火烧三日不绝”等，寥寥数语后面，不知多少生灵涂炭，多少财物被掠、房屋被烧。

民国时期，周家口匪患危害巨大，绑架勒索、手段残忍，危害经济、破坏发展。民国13年，杆首路老九攻破周家口后，绑票数百人，甚至把周家口士绅李国璠(外号李八少)也绑了去，最后其用30万银元赎回。另一富户樊姓之子用18万银元赎回，其余赎价不等，贫困者“亦索洋三五十元”。民国15年，杆首牛绳五攻陷北寨占据7日，出周家口时，掠去男女票约千人。土匪黑话把抓到的人票称为“叶子”，出城时，“叶子阎

王”(黑话，负责看管人票的小头目)命令把“叶子”的胳膊用麻绳捆起来，连成一串，一有风吹草动，“叶子阎王”就大声吆喝“拉地硬些”(黑话，走快些)。听不懂这些黑话的“叶子”如走得慢点，“叶子阎王”的棍子就雨点般地抽向“叶子”，年龄大的“叶子”实在跑不动了，就会被当场枪杀，以警示其他“叶子”。为索要赎金，土匪会对“叶子”家的贫富情况进行甄别，黑话叫“滤叶子”，就是对“叶子”进行严刑拷打，或吊在房梁上火烤，或直接用棍子打皮鞭抽，更为骇人的还有割耳、挖眼、膏药贴眼睛、松香焊耳朵等酷刑，有的“叶子”甚至被当场打死。《时报》对民国15年杆首牛绳五攻陷周家口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周口南寨于十三年，曾被匪首路老九攻破一次，三年以来，元气未复，今又大受荼毒，从此周口当日见凋零矣”(《时报》1926年10月5日)。《申报》也指出“此次被灾之剧，较之往年白狼老洋人、路老九诸匪所为，残酷十倍”，并预测“虽二十年难望恢复原状”(《申报》1926年12月15日)。《河南周口与陈留匪祸之经过》记录了民国15年8月，牛绳五破寨逃走周口的惨状，“查两寨焚烧房屋，约有十分之六，人民死亡不下二千余，掳去男女票约千名。该匪逃后，天又大雨，当时寨内一空，生存之人民，少衣乏粮者甚众，殊可惨也”。

豫东土匪猖狂的原因主要

是，土匪人数众多，政府治匪不力，防守兵力不足。民国时期，天灾连年，军阀混战，吏治腐败，税赋繁重，饥民变流民，流民为活命铤而走险落草为匪，到1922年时“河南土匪大小共有二百多股，人数达六七十万”(《河南大举剿匪之情形》，《申报》1922年12月17日)。虽然北洋政府制定了严厉的《惩治盗匪法》，但地方政府由于经费等原因，甚至招匪为兵，士兵拖枪看匪，兵匪一家。从地理位置上看，周家口南北三寨分属于商水和淮阳，与之相邻的项城、沈丘又是豫皖两省的交界地带，交通发达，易攻难守，周家口地区因此成为了土匪大肆活动之地。周口、商水、沈丘、项城多次城陷，更有甚者，民国16年9月，项城被土匪攻破，县长姚文蔚也被绑为人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繁华的周家口已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1948年，陈毅和邓小平联名给毛泽东写报告，言及河南匪患，“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中共中央对河南剿匪工作非常重视，在发动渡江战役后，留下第四野战军2个军5个师，加上10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组成15万人的强大兵力在河南剿匪。周口市人民政府(1948年1月17日成立，属淮阳专区)按照上级指示，积极响应，广泛发动群众及地方武装，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彻底扫清了周边的土匪，百年匪患销声匿迹，周口从此获得了新生。

## 书画欣赏



李志向作